南开历史光影百年，南开教育璀璨当代

———百年南开的教育探索

（计算机学院 2211757 赵元鸣）

摘要：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南开大学在教育发展遇到的历史问题，与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文章聚焦于南开教育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发展。其独特的教育传统与社会互动，凸显出南开在塑造中国教育史的角色。文章探讨了南开教育的特色，并展望了其未来发展的蓝图与使命，考察南开大学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其对社会的影响之间建立了联系，阐述了南开教育的演变与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一、励步踽行：南开缔造与教育探索

南开大学，建校于1904年，创办人严修、张伯苓，被誉为周恩来总理母校。历经沧桑，1937年校园被日军炸毁，后南迁，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复校。新中国成立后，多位领导亲临视察，支持发展。学校于1952年成为全国文理并重的重点大学，后得到“211工程”和“985工程”支持，2017年成为“双一流”高校。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学生，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在国际上，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与330余所国际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培养了全球范围的留学生。学校致力于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回顾南开大学创立之初，南开大学在民国时期以"私立非私有"的管理体制著称。这一体制下，学校的办学经费并非由个人出资，而是来自社会捐赠，用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这体现了其与传统私立学校的区别，私立大学类似于一种社会产业，其财产属于社会，用以造福民众。校长张伯苓一直强调，南开不属于某一出资团体，而是为国家而生。南开在管理上采用法制化建设，制定严谨的规章制度，并实行师生共同治校，师生合作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同时，学校务实地推行校务公开，使师生可对学校的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这种管理模式为南开赢得了政府的赞誉，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典范。然而，与当代民办高校相比，当时学校的管理模式多为家族式，偏重于管理效率而忽视规章制度的合法有效性，相较于民国时期的南开大学，整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1]

南开大学在探索“大学之道”上走出了坚实的步伐。南开大学从1919年创办起，到1946年被当时政府收归国有，随着干预逐步增加，大学的“自主权”受到影响，南开大学也因此在权力博弈中走向天平的另一端。这其中，最能代表南开大学与政府权力博弈的便是1927年的“南开学潮”和1937年的“危机”。此时的政府可以在教育资源分配中对南开大学进行严厉的限制，而南开大学在自主办学上陷入被动。[2]在1927年，南开校长丁传熙先生曾以拟退出联合国际教育会为要挟来反抗北洋政府的限制；在1937年的危机时刻，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中央政府对南开的长期限制，南开大学不得不逐渐寻求日军支持，以获得教育资源。这些办学策略的调整和选择表明南开大学对外来干预的抵抗和适应能力，并使南开在外界压力下也持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性。

而探索大学教育之路，却并不一帆风顺。南开大学在1924年末至1925年初的"轮回教育"风波，突显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由于过度西化所面临的问题。针对这种盲目西化的教育体制，南开大学师生采取了一些务实的改革措施，包括课堂教学语言、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探索出了以服务国家与社会为导向的中国化道路。[3]这次南开大学的教育中国化改革不仅在该校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民国时期，南开大学就解决中国大学历史问题，迈出了向本土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以务实的态度取得了显著成就。张伯苓创建南开时，便着眼于根据国情定制教育宗旨，引领该校开展了多方面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教学语言的转变，从纯粹的西方化向国语教学迈进。[3]同时，教师们开始着手编写中文教材，以取代之前广泛使用的英文教科书。此外，课程设置也发生了积极变化，逐渐增加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课程。南开大学还高度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视之为学生了解国情的重要途径。这些变革不仅使得教育更加契合中国实际情况，也推动了学术中国化的进程。

南开大学的办学历程，实际上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南开之创办，“其目的同在于求中国民族之自存。凡所取法，始则似同日本，继则俱效欧美，今则又趋于独立自创之途”。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便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探索“独立自创之途”的一次有益尝试。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为改造和服务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的最大动力来源于“教育救国”理念。南开大学为使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迟早也会进行中国化改革，这场风波不过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教学实践，是以实用为导向的。1926年，南开大学的文科进行了整顿，将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和历史五系调整为政治和经济二系，其目的在于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目前中国社会需求更大的专门人才，以培植政治经济之坚。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３３年间南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排在前三位的职业分别是教育、商业和实业，亦符合张伯苓在办学之初所期望达到的“文以救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理念。除人才培养外，南开大学的教育中国化改革还孕育出大量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无论是课程内容的中国化改良，还是相关教材的编写，都迫使教授们在课堂之外从事更多的研究工作，运用从西方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来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从而在学术中国化方面创造出丰硕的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为时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与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矫正了部分教师和学生“中劣西优”的心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自信心。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曾说道，中国作为后进国，在学术上“必须经过模仿禆贩之一时期”，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当模仿已达到相当成绩之后，中国学术界不应以此为满足，而是应当渐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但如若高等院校作为孕育学术的主力军，却完全沉浸在崇洋媚外的风气之中，又何谈学术独立呢？要改变这一风气，就需要提高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自信心。南开大学的“土货化”教育一方面培养了学生时刻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使命的民族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知晓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以更加理性的心态对待中西学术文化，从而对西方文化少一分谄媚，对中国文化多一分自信。

在不断解决与社会、与学生的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南开大学以其教育变革之举成为本土化教育的领头羊。张伯苓创立南开，即确立了根据国情定制教育宗旨的理念。从教学语言转变、中文教材编写到课程设置的全面调整，南开大学率先展开了多方面的教育中国化改革。此外，南开极其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国情。这些措施不仅使得教育更贴合中国实际，也促进了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南开大学在求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成为中国教育本土化的先驱。

二、现代焕新：当代南开与教育创新

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发展，南开大学成长为了一座学术氛围浓厚、历史底蕴坚实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在2019年启动了本科教育创新改革，提出了“40条”措施，其中涉及了师生共同成长的理念。这个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回归师生共同体的教育观念。他们提出了“师生交流双循环”模式，旨在促进教师的教学研究与创新，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认同，同时支持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助。[4]这一改革不仅形成了一批优秀课程，还为高校创造了一种“教有幸福感，学有获得感”的教学氛围。

南开大学在落实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方面，以“南开40条”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构建新时代师生发展共同体。这包括了南开大学制定的《南开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其中“南开40条”着眼于提升育人效果，将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作为重点。[5]通过建设课堂教学主阵地、课外实践和环境建设等三大平台，强调“教师发展协同”、“学生成长互进”、“师生融通互促”、“学科交叉互鉴”等四种贯通，构建出育人理念清晰、学科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教育生态系统。

南开大学在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下，对通识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重新规划通识课程模块，聚焦于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与四新人才培养结合，旨在培育新时代人才。此次重构特别突出了价值观与信念引领的主线，突显了中国发展成就与前沿需求的重要性，以中国发展为学生提供成长的方向。

南开大学以校级教研团队为抓手，通过组建十四个校级教研团队、近150名一线教师的参与，推动教学改革和教育思想的宣传。这些团队直接瞄准素质教育改革，致力于强化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推动学生自我认知的提升。教务处也通过管理职能转化为实际服务，组织高频度的教学研究论坛、跟踪教改推进工作，促进了高校教育新生态体系的孵化，实现了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南开大学通过校友资源助力母校学生就业工作展现出卓越成效。优秀校友在本单位的杰出表现成为母校的无形广告，吸引单位持续招聘毕业生，形成良性循环。[6]校友企业回母校招聘、校友亲自指导在校生职业生涯规划等直接有效，成为助力母校就业工作的重要手段。南开大学持续举办“校友助成长”系列活动，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助力在校生实习实践与就业。其中，“师兄带我去战斗”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已成为校友活动品牌项目。校友企业和校友担任重要职位的单位通过专场招聘会为学弟学妹提供就业机会，有效促进母校就业工作。

当代南开大学在教育创新上展现活力。倡导师生共同成长，促进教学创新与学生发展。积极推进爱国主义教育，调整通识课程，培养全球视野与中国自信。南开在教育创新上蓬勃发展，继承传统，迎接当代挑战，塑造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三、未来蓝图：南开教育框架展望与使命

回顾过往，南开大学见证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全历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缩影。其创办经历和办学道路代表着中国教育的跌宕起伏，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奇迹”，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和历史价值。南开大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教育思想智慧，凝结了“南开道路”“南开品格”“南开特色”和“南开精神”。[7]这些特色和传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极强的辨识度和影响力，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典型案例。

展望未来，南开教育展望着眼于创新发展。南开教育未来的愿景在于构建全球化视野与本土责任并重的教育体系。未来，南开将致力于推进教学模式的创新，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学生。构建教育框架着重于培育具有国际视野与中国担当的优秀人才，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南开将继续以"南开道路"为引领，注重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领学生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与信念。紧跟时代潮流，注重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其使命在于打造学术卓越与社会责任并行的现代化教育体系，为培养未来世界的领袖和社会精英而不懈努力。其使命在于培养有担当、有情怀的全球化领袖，为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蓝蓝. 民国时期“私立非私有”高校管理体制及其启示——以南开大学为例[J].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 2023(3): 26–30.

[2] 唐斌. 私立南开大学的研究力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述评[J]. 生活教育, 2022(3): 124–128.

[3] 张喆. 民国高等教育西化的困境与出路——以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为中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23, 27(4): 78–85.

[4] 李川勇. 大学素质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南开大学“师生共同体”的构建与实践为例[A]. 大学素质教育（2023上半年合集）[C]. 2023: 5.

[5] 李川勇, 冯大建, 余华. 大学素质教育的共同体与内驱力研究——以南开大学为例[A]. 大学素质教育（2022上半年合集）[C]. 2022: 6.

[6] 任正杰. 校友资源助力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分析——以南开大学为例[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4): 5–7.

[7] 石培华, 陆明明. 大学教育基因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传承启示与对策研究——以南开大学为例[J]. 未来与发展, 2021, 45(11): 102–108.